

# 對日抗戰在中國和臺灣的歷史記憶歧異

## —— 中國和臺灣的抗戰

傅敏雅

1945年5月7日凌晨，在不久前才佈置成盟軍臨時總司令部的法國 Reims 現代技術中學<sup>①</sup>，德國代表在海軍元帥鄧尼茲率領的臨時政府授權下，與艾森豪將軍率領的盟軍簽署了第三帝國軍隊投降書。翌日，這項協議正式生效，歷史上以這一天作為歐洲戰場停戰、反德國納粹戰獲勝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也隨之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軍投降儀式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軍戰艦「密蘇里號」上正式舉行。儘管真正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劃下句點的是日本的投降，但是在歐洲，最主要的紀念日還是1944年6月6日盟軍登陸諾曼地和1945年5月8日德軍投降這兩天。

2005年5月8日是德軍投降60週年，各種紀念活動中發表的演講和官方聲明，旨在歌頌盟軍擊敗納粹的功績。在法國政府於巴黎凱旋門舉行的紀念儀式中，德、義兩國的青少年代表團也應邀出席，凸顯出歐戰的重大意義在於把整個歐洲大陸從野蠻殘暴的納粹手中解救出來，真正的敵人不是德國和德國人，而是納粹法西斯政權。儘管這一觀點在今天的德國已經獲得共識，但是在蘇聯紅軍進駐後才得以「解放」的地區卻仍頗受質疑(譯者註：在一些曾經處於前蘇聯勢力範圍的地區，有學者認為當時蘇聯抗擊法西斯的目的也是出於私利)。無論如何，二戰的意義在於擊敗法西斯政權這種觀點還是體現了當前紀念二戰的意義<sup>②</sup>。

紀念儀式是公開的集體活動，為鞏固利益共同體與共同的身份歸屬提供機會。紀念活動承擔著教化民眾的使命，透過這種活動，一個社會從有利於其現在和未來發展的立足點出發，而賦予其過去某種象徵意義<sup>1</sup>。正因如此，紀念活動使用的語言涵義多變、用意深刻，推動一個群體不斷重構其基本政治觀和社會觀。2005年的紀念活動做出了如下詮釋：同盟國的軍隊為了捍衛民主和人權而拋頭顱、灑熱血，因此，這些道德價值觀是當今乃至未來的歐洲人全體認同的基礎。

---

<sup>1</sup> 可參閱法國國防部記憶、資產及檔案局 (la Direction de la mémoire, du patrimoine et des archives) 的網站「Chemins de mémoire」上關於「共同紀念」的定義：<http://www.cheminsdememoire.gouv.fr>，2008年8月。

<sup>②</sup> 譯者註：原法文還確切指出臨時指揮部是由法國蘭斯市新式技術中學的一間校舍臨時佈置而成，譯者出於譯文通順緣故未將這一細節寫出。

2005 年夏秋，中國和臺灣也同樣舉行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但他們最主要的紀念日不是 5 月 8 日德軍投降，甚至不是 9 月 2 日日軍投降，而是「抗戰勝利」。抗日戰爭無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重要一環，但這場戰爭，特別是關於其經過和結果的描述，在中國和臺灣受到了特別的關注。紀念活動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這段慘痛而漫長的歷史：1937 年爆發、1945 年結束的八年浴血抗戰雖贏得光榮勝利，卻難以掩蓋為獲得勝利而付出的巨大代價，即軍民雙方在戰鬥中大量傷亡的慘烈犧牲。西方人在講述二次大戰時很少提及中國抗日的經過，而中國和臺灣對八年抗戰似乎也有相當特殊的看法。誠然，中國近年來更為強調抗戰和世界大戰之間的聯繫，但海峽兩岸仍一直認為抗戰是中華民族在危急存亡之秋發揮偉大的民族精神奮起自救、浴火重生的立國基石，因此很少將抗戰勝利和在西方人心目中標示著大戰結束的諾曼地登陸、蘇聯紅軍挺進、美國向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等歷史事件相聯繫。值得慶祝的並非勝利本身，而是在漫長的抗戰過程中乍現的曙光。擊敗敵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進行了這場戰鬥，並且得勝的一方證明了自己所領導的是正義之戰。

從個人到政黨，從地方到國家，形形色色的抗戰紀念日顯現出抗戰紀念多麼受看重，多麼富有中華民族史教育意義<sup>2</sup>。中國和臺灣既未將抗戰和當時的整個國際背景明顯地聯繫起來，他們對於抗戰的詮釋也大幅超越了 1937 至 1945 年的範圍。紀念抗戰不僅可以抒發從 19 世紀列強侵略至辛亥革命前後內戰的痛苦記憶，還能驅逐有朝一日臺灣可能會和大陸決裂的擔憂。

兩岸視抗戰為「自家事」並非出於對當時政治歷史背景的無知。許多關於這段時期的歷史學研究、傳記和紀錄片等資料都強調國際關係對於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是何等重要。例如，一些研究顯示在 30 年代初期日本侵華時，民國政府希望做出符合國際聯盟指示的回應。民國政府起初採取息事寧人的政策，固然是顧慮到國內形勢，但也是出於想遵守國際聯盟決議的初衷<sup>3</sup>。另外，蔣介石之妻宋美齡的外交才幹在海峽兩岸都受到贊許。她最為人稱道的貢獻是 1943 年冬在美國國會的成功演說。宋美齡和羅斯福夫婦過往甚密，在他們的大力支持下，她極力說服了美國國會同意擴大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sup>4</sup>。宋美齡在美國各地的演講顯示，民國政府深知支撐美軍信仰的是追求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觀，所以非常希

---

<sup>2</sup> 主要有六個紀念日：

1931 年 9 月 18 日（「九一八事變」）：日軍侵入中國東北，數月內攻占滿州里，擁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為帝成立了滿州國。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後，日軍繼續擴張。國共合作標誌著抗日戰爭的開始。

1945 年 8 月 15 日：裕仁天皇宣布戰爭結束。

1945 年 9 月 3 日：日軍投降正式生效。從 50 年代初起，臺灣定此日為軍人節。

1945 年 9 月 9 日：日軍在南京簽署中國戰區日軍投降書。

1945 年 10 月 25 日（「光復」）：臺灣回歸祖國懷抱。

<sup>3</sup>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 年），第 254-260 頁。

<sup>4</sup> 可參閱：《世紀宋美齡》（根據史料拍攝的臺灣紀錄片）（台北：2003 年）；

陳延一：《宋美齡全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 年），第 270-286 頁。

望美國人相信抗戰同樣符合這些價值觀<sup>5</sup>。此外，臺灣（至少在 2000 年以前）再三強調蔣介石代表中國與其他三「巨頭」平起平坐，在規劃戰後世界格局的工作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sup>6</sup>。

紀念活動想要打動的是一個群體的內在及情感。法國社會學家 Roger Bastide 強調，這種想像植根於某個親身經歷或非親身經歷的過去，然後經過傳遞或表現成為「記憶」<sup>7</sup>。無論是記憶的起源或其影響所及，均與當今社會脫不了關係。召喚回憶，往往需要借助當前社會環境中的種種信息點來重建過去<sup>8</sup>。此外，只有以群體所承認、所推崇的共同過去作為參照，群體目前的經歷和對未來的設想才有價值和意義<sup>9</sup>。正如政治學家 Marie-Claire Lavabre 所說：「記憶是一種與過去的關係，然記憶之最終目的並非認識、理解真實的過去，而在於現在的真相，在於構築、鞏固群體的身份認同。」<sup>10</sup>

紀念活動既表現記憶，本身也構成記憶，主要作用在於通過集體活動號召群體中的成員承認群體的存在合理性，並能繼續在群體中找到歸屬感。法國歷史學家歐內斯特·雷南（Ernest Renan）研究民族的本質和民族延續的基礎。他認為這一共同的想像很重要，形容其為「民族之魂」，是全民「共同擁有的豐富的回憶資產」<sup>11</sup>。不斷鞏固共同生活的意願固然是國族延續的決定性因素，經常提醒人們追思一段由共同經歷的光榮及痛苦交織的過往，更能加強人們堅守盟約的決心。其實，共同經歷的苦難更有力量：「對於國族記憶來說，哀悼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哀悼讓人們擔起責任，共同努力<sup>12</sup>。」所以，紀念是向前人付出的「努力、犧牲和奉獻」致敬<sup>13</sup>，立下追隨前人的意願。從這個角度來看，紀念難免變成「自己人」共享的時刻，只有對「我們」才有意義。

抗戰勝利紀念活動在中國人之間無疑能引起巨大的情感共鳴，然而近年來在臺灣，抗戰紀念卻越來越難獲得共識。早在 1995 年，此類紀念活動就引起了激烈辯論，有人質疑是否應該將抗戰納入臺灣社會的歷史記憶。雖然臺灣承認抗日戰爭是中華民國歷史的一部分，至少是民國在大陸的經歷，不過

<sup>5</sup> 同註 4。

<sup>6</sup> 《抗戰與臺灣光復史料輯要》（台中：臺灣文獻委員會，1995 年）。

<sup>7</sup> Roger Bastide, “*Mémoire collective et sociologie du bricolage*”（集體記憶和變通社會學），*L'Année sociologique*（《社會學年鑑》），第 21 卷（1970），第 78 頁。

<sup>8</sup> Maurice Halbwachs,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記憶的社會背景），chapitre III (la reconstruction du passé) et chapitre IV (la localisation des souvenirs), (Paris: Albin Michel, 1994, 2ème édition) pp. 83-145.

<sup>9</sup> Maurice Bloch, “*Mémoire collective, traditions et coutume. A propos d'un livre récent*”（集體記憶，傳統和習俗——關於一本新書），in Marc Bloch, *L'histoire, la Guerre, la Résistance* (Paris : édition établie par Annette Becker et Etienne Bloch, Paris, Quarto Gallimard, 2006) p. 340. (附註：該文首次刊登在《la Revue de synthèse》第 40 卷（1925 年 12 月），頁 73-83)；

Maurice Halbwachs, pp. 112-113.

<sup>10</sup> Marie-Claire Lavabre, “*Usage du passé, usages de la mémoire*”（過去的用途，回憶的用途），*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法國政治學雜誌），44（juin 1994），p. 487.

<sup>11</sup> Ernest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民族是什麼？），（Paris : Mille et une nuits, 1997）p. 31.

<sup>12</sup> 同前註，第 32 頁。

<sup>13</sup> 同前註，第 31 頁。

某些臺獨激進人士完全否認抗戰和臺灣社會的關係，認為臺灣自 1895 年起被割讓成為日本殖民地，因此在二次大戰期間臺灣人民被徵召加入日本皇軍，所以抗戰不屬於臺灣人的記憶。

歷史學家藍適齊認為存在「移植的記憶」和「壓抑的記憶」這兩類記憶。中華民國收復臺灣後宣揚的中國民族史屬於前一類記憶，包括直到 90 年代末期臺灣教科書和官方歷史著作中的內容。藍適齊認為對於臺灣人個人來說，這一記憶源於在大陸的生活經歷，並非絕大多數臺灣人所有。官方宣傳導致了臺灣人對過去的「虛假記憶」，誤以為臺灣人和中國大陸同胞一樣參加了抗戰。藍適齊認為這種「虛假記憶」逐漸抹殺了臺灣人（無論是漢人還是原住民）關於戰爭的真實記憶。有些臺灣人受徵召加入日軍；有些臺灣人到大陸響應抗日卻被疑為漢奸，吃盡苦頭；所有這些都在以團結抗日為重的解讀中被完全抹煞<sup>14</sup>。直至近年，這些真實的記憶才透過學術著作或電影傳播開來。

雖然官方版本的抗戰極少論及臺灣人作為被殖民者與日軍共同侵華的經歷，但這並不表示此一記憶在臺灣人的集體想像中不存在或不被承認。

我們應該區分歷史記憶<sup>③</sup>和集體記憶。集體記憶由各個情感共同體（如家庭、族群或社會實體）的記憶組成<sup>15</sup>，可能帶有歷史記憶的烙印，但不能套用歷史記憶的模式。國家為了政府機構的延續和民族統一，在國族歷史的問題上側重一種簡化的、向上的、能夠凝聚全民共識的解讀。一個國家越有其存在受到威脅的危機感，就越要掩飾其歷史上的「倒退」和「錯誤」，避免這些經歷導致國民喪失信心、意見分歧、提出質疑。自 1945 年臺灣成為中華民國領土後，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就壓制著臺灣人的真實記憶，1949 年民國政府遷台後更是變本加厲。與此同時，大陸則忙於建立「新中國」，並可藉機重新定位她和過去、和歷史的關係。但是，稱臺灣人的記憶被壓抑是否就恰當呢？可以封其口、囚其身，難道也可以抹殺記憶嗎？往事總會留下痕跡，想陳述歷史的人總能依循一些蛛絲馬跡讓歷史真相大白，這些記憶經常是在家族之間世代相傳，延續不絕。

例如一些從中國或東南亞戰場倖存生還的臺籍日兵講述他們如何把戰友的骨灰帶給遺屬<sup>16</sup>。這些歷盡千辛萬苦運回故里的骨灰，難道不會受到百般重視嗎？每逢清明節等節日，掃墓的家人不免會唏噓感嘆一番，向好奇的子孫們講述這位參加過日本皇軍的祖輩或是父輩所經歷的滄桑。

同樣，倖存的士兵也深深記得戰爭後期他們從中國海南島歸來時國民政府官員對他們的苛刻待遇。由於軍隊重組，他們不得不在物質和衛生條件極為艱苦的情況下苦熬數月後才得以重返臺灣。包括《新生報》老闆在內的臺灣知識分子聞訊立刻採取行動，為他們安排歸臺事宜及提供緊急醫療救助。

<sup>14</sup> Mike Shi-chi Lan (藍適齊), "Neither Victors nor Victims: transplanted/ suppressed memories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postwar Taiwan", *IIAS Newsletter* #38(September 2005), p. 11.

<sup>15</sup> 「情感共同體」一詞來自 Marie-Claire Lavabre 對於 Maurice Halbwachs 之作品所做的解讀。參閱：Marie-Claire Lavabre : "Maurice Halbwachs et la sociologie de la mémoire", *Raison présente*, n°128, p. 53.

<sup>16</sup> 周婉窈：《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並相關資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年），第 124 頁。

這樣的事，難免會在家庭、街坊鄰居或同事之間討論吧<sup>17</sup>？應該也會載於報端，存於日記，傳於書信？萬一出於什麼原因必須保持沉默，這些塵封的物與情，說不定哪天會「浮上檯面」？歷史學家周婉窈對臺籍日兵做過深入研究，收集了他們從戰後以來一直悉心保存完好的存摺、人壽保險證明等個人資料<sup>18</sup>。如果這些收在信封裡、抽屜裡的資料被人不經意地翻出，或放在桌上忘了收起來而被人看到，總會引發問題，促使當事人娓娓道來，讓這些記憶廣為流傳？家裡總會有一個人願意講述這段已經走入歷史的生平。

但是，稱臺灣抗戰史是「虛假記憶」似乎並不恰當。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後並沒有完全切斷與中國社會的聯繫。眾多臺灣文人其實仍十分關注二十世紀初中國動蕩的政治社會局勢。一些臺灣人甚至與流亡日本的中國改革家和革命者會面。1921年創辦臺灣文化協會的林獻堂就極為推崇梁啟超，據說不僅於1907年和梁啟超在奈良會面，還於1911年接待他赴台<sup>19</sup>。20年代，一些在中日受過教育的臺灣青年受到國際上反帝國主義和倡導民主思潮的吸引，紛紛在臺灣、東京及中國各大城市建立種種主張臺灣脫離日本統治的團體，他們的最終目標有的是要求臺灣獨立，有的是要求回歸祖國；傾向溫和和改革者認為這是長遠的事業，傾向革命者則要求立竿見影<sup>20</sup>。其中在台最活躍的兩個即文化協會和民眾黨。民眾黨由蔣渭水和蔡培火於1927年創建。蔣渭水仰慕孫中山，非常支持孫中山晚年保護勞工的政策。民眾黨因漸漸左傾而於1931年遭到查禁，其黨員紛紛逃奔大陸<sup>21</sup>。1937年起，擁護統一的各種小團體在國統區參加抗日活動，其中一個為李友邦創建的臺灣義勇隊。1941年，這些團體在重慶組成臺灣革命同盟會，誓言保衛祖國江山並收復臺灣<sup>22</sup>。

臺灣人參與抗日一事自60年代末期開始成為公開辯論的話題。第一批政治反對派「黨外人士」將這個話題「炒熱」，以爭取民眾的支持<sup>23</sup>。在老一輩的黨外人士中，不乏曾在大陸參加抗日戰爭的人<sup>24</sup>。儘管可能出於自尊，這些人敘述自己的抗戰經歷時多少有些美化，但是這個主題很快就受到了吳濁流

<sup>17</sup> 同上註，第27、50頁。《新生報》主編之女亦談及此話題。

<sup>18</sup> 臺籍士兵在80年代向日本法庭要求賠償時，就是用這些文件作為證據。2008年4月我和周女士在台北會面，她熱心地向我展示了其中一些文件。

<sup>③</sup> 譯者註：歷史記憶是指官方認可並宣傳的回憶。

<sup>19</sup>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年），第24-30頁。侯孝賢2005年的電影《最好的時光》中，臺灣文人仍然把中國看作祖國，體現出兩岸的感情聯繫。

<sup>20</sup> 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中的「中國座標」和「臺灣座標」，《當代》第17期（1987年），第40-41頁。

<sup>21</sup> 同前註，第45頁。

<sup>22</sup> 同前註，第44頁。

<sup>23</sup> 參閱蕭阿勤的文章。

<sup>24</sup> 這些事情在侯孝賢1995年的電影《好男好女》中有所描述。電影描述的悲劇使人想到李友邦抗日。50年代白色恐怖初期臺灣菁英遭受鎮壓，李友邦成為受害者。

等作家的注意，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刻畫出臺灣人既受外國政府統治又遭大陸民眾懷疑與敵視，「裡外不是人」的苦衷<sup>25</sup>。

不管是抗日還是參加日軍，如我所述，這些記憶都留存在今天的臺灣。本文將按照時間順序討論關於抗戰的記憶，審視紀念抗戰的政治和社會意義，同時考察中國和臺灣兩岸社會對歷史的不同解讀，分析兩者關係並預測未來趨勢。

## 1、 關於記憶的各種政治和外交詮釋

民國政府遷臺後，中國分裂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政體，因此解讀抗戰時，兩岸政府最初的考量都是強調各自的正統地位，同時在國際上爭取盟友。特別是北京新建立的政權還不穩定，中國政府更是對1937年到45年的歷史前後提出了幾個不同版本的解讀。這些詮釋先隨著中國政府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扮演的角色而變化，之後又隨著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而變化。國內政局的動蕩也給抗戰紀念染上了一層特殊的色彩。因為抗戰與中國共產黨的經歷息息相關，所以最初慶祝的是共產黨的勝利，後來漸漸地才變成了超越黨派和領土爭端、向整個中華民族致敬的活動。

### 抗戰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並得到蘇聯老大哥支持

50年代初，中蘇交好，中國藉著抗戰紀念活動感謝蘇聯的支持。1950年，新成立的中國政府首次紀念七七事變，在紀念儀式上，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主席做了發言，確定了抗日戰爭今後的意義。委員會認為抗戰是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的偉大戰爭，而蔣介石一流則把中國出賣給「日本帝國主義」，戰後又轉而投靠「美國帝國主義」。抗戰依靠唯一的盟軍蘇聯才取得了勝利<sup>26</sup>，這一解讀把中華民國所做的貢獻和美國的物質、政治支持都一筆勾銷。1951年中國全面投入韓戰時，該說法最終得到認可。《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為9月3日的紀念活動提出綱領精神，強調「中國人民」百年來經過不懈努力，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和蘇聯支援下擊敗了帝國主義，取得了抗戰的勝利，剩下要面對的是「死敵」美帝國主義<sup>27</sup>。

60年代中蘇交惡，抗戰從而產生新解釋。1965年紀念日本投降時，新華社發表社論，贊揚中國人民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取得了勝利，文中隻字未提蘇聯<sup>28</sup>。9月3日，林彪在《人民日報》上刊文，稱蘇聯是蘇修帝國主義，絲毫不提及抗戰時期的外國援助。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抗戰又有了新的詮釋。

<sup>25</sup> Claude Geoffroy, *Le Mouvement indépendantiste taiwanais (臺灣獨立運動)* (Paris : L'Harmattan, 1997), pp. 237-238.

<sup>26</sup> 韓福東：〈60年的紀念與忘記〉，《鳳凰週刊》2005年6月第18期，第58頁。

<sup>27</sup> 同前註，第58頁。

<sup>28</sup> 同前註，第58頁。

1975年，中國認可史達林領導的蘇聯紅軍和人民的「功勳」，但稱蘇聯政府是帝國社會主義，企圖在亞洲建立霸權<sup>29</sup>。

直到80年代改革開放深入，官方才較全面地解釋了1937至1945年的歷史和政治，更為尊重中國人民真實的抗戰經歷，換言之，就是抗戰留下的活生生的記憶。

## 開始弘揚抗戰是民族鬥爭

70年代末起，中國政府推動社會經濟轉型，同時大力推動統一計劃。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政策，為中國收復自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和1949年國民黨撤退後喪失的領土開闢了一條可行之道。這或許說明了1985年紀念活動上措辭的種種變化。1985年，紀念的對象不再是中國人民的鬥爭，而是中華民族。《人民日報》上採用「全民抗戰」和「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sup>30</sup>的說法，紀念的對象從而超越了中國大陸人民，延伸到當時仍受外國政府統治的港、澳地區的民眾和不能合法代表中國的民國政府。將抗戰歸功於整個中華民族需要重新詮釋歷史，雖然中共的領導地位仍放到首位，卻認可了國共合作的功績。以中華民族前途為立足點，使得這段歷史產生了新的意義：「統一祖國」可「振興中華」，振興的不再是定都於北京的中國政府，而是「中華」<sup>31</sup>，即歷史、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擁有數千年文明的中國，存在於想像和靈魂中的中國。

1985年8月19日至24日，北京召開的中央會議上認可了這種說法。抗戰勝利40週年時，紀念活動的重心放在國共合作的政治統一戰線。抗戰從而區分出兩個戰場：國民黨政府負責的前線和共產黨麾下之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所負責的後方。共產黨仍認為自己是整個抗戰的政治領導核心。出席這次會議的歷史學家特別強調要根據當時國際環境重構歷史，即抗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和反法西斯鬥爭的聯繫。與會學者認為反法西斯鬥爭始於亞洲，中國應該突破當時尚存的黨派局限，不要把抗戰描繪成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sup>32</sup>。歷史學家還建言政府應更尊重歷史，重視一些原先很少提起的人，或是用來攻擊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人，因為他們也為中華民族的反法西斯鬥爭做出了犧牲<sup>33</sup>。

重視民眾的真實經歷，特別是最為痛苦的經歷，將使紀念儀式帶有豐富的情感色彩，提高號召力，凝聚人心。這一新取向最明顯的例子是1985年開館的南京大屠殺紀念堂<sup>34</sup>。南京在1937年12月13日

<sup>29</sup> 同前註，第58-59頁。

<sup>30</sup> 韓福東引用了這些文章，同前註，第58-59頁。

<sup>31</sup> 可參閱：韓福東所引用的〈全民抗戰，勝在團結〉一文（作者為胡厥文），同前註，第58-59頁。

<sup>32</sup> 同註26，第58-59頁。

<sup>33</sup> 同註26，第58-59頁。

<sup>34</sup>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分析，參閱：Jean-Louis Margolin, *L'Armée de l'Empereur*（天皇的軍隊）（Paris：Armand Colin, 2007），pp. 169-215.

被日軍佔領後慘遭蹂躪。官方對這段歷史的承認可能推動了 1985 年 9 月 18 日中國青年的大規模示威。1985 年九一八事變紀念日當天，中國青年上街遊行，指責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年年參拜供奉戰犯的靖國神社分明是有意挑釁<sup>35</sup>。1982 年也發生過一場反對日本篡改教科書的示威活動<sup>36</sup>。一些報紙開始刊登戰爭受害者的投訴見證，戰爭的記憶這才開始變得有血有肉。

## 二、抗戰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資產和共同記憶

在 1995 年的一系列紀念儀式上，關於抗戰記憶的敘述交織著光榮與哀悼。根據 Ernest Renan 的觀點，這樣做有利於讓民族內的人團聚在一個有著濃厚感情意義的回憶周圍。此外，1995 至 2005 年間臺灣各政黨之間的關係也使臺灣問題影響了對這段歷史的解讀。

### 確定凝聚人心的價值觀

1995 年，抗戰勝利 50 週年的籌備工作開始得特別早。通常第一個紀念日是 7 月 7 日，但早在 1995 年 3 月，李鵬把當年定為紀念抗戰及二次大戰勝利五十年<sup>37</sup>。聯繫抗戰和二戰解釋了為什麼早早定下紀念日程。這一年，紀念範圍擴大到歐洲和盟軍這些國際概念。中國官方為彰顯新的外交姿態，第一次把抗戰和世界大戰聯繫起來。歷史學家不枉十幾年苦口婆心，終於如願看到政府在慶祝儀式上大加表揚其他國家對抗戰做出的貢獻。至於當時這些國家是傾向南京政府、重慶政府還是延安都好像變得無足輕重。9 月 3 日，江澤民發表講話，不僅向美國、英國和前蘇聯給予的物質和軍事支持致敬，同時也向這些國家在支持中國反法西斯鬥爭中所付出的沉重的生命代價致敬<sup>38</sup>。

1995 年 4 月 10 日的《人民日報》同樣刊文贊揚二次大戰是保衛和平、反對強權的鬥爭。隨後進一步講述了二戰在中國戰場的事件。認為抗戰繼承了「中華民族」抵禦侵略的「光榮傳統」，抗戰勝利更加堅定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sup>39</sup>。文章一方面認可「浴血抗戰的光輝業績」，一方面稱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sup>40</sup>。《人民日報》稱，回顧 1937 到 1945 年這段時期，可以塑造中華民族的光榮形象並將之展現在世人眼前，一掃中國受列強侵略、被迫割地賠款、辱國喪權的舊形象。中華民族擺脫了政治、經濟、社會的動盪與衰敗，而以有信心、有擔當的新姿態登上國際社會。文章指出，領導中國人民走向輝煌的仍是以「全心全意為人們服務的延安精神」<sup>41</sup>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

<sup>35</sup> 同前註，第 430 頁。

<sup>36</sup> 同前註，第 430 頁。

<sup>37</sup> 張瑞德：〈紀念活動與政治〉，《紀念七七抗戰流失週年學術研討會文集》（台北：國史館 印行，1998 年）頁 1078。

<sup>38</sup> 同註 26，第 59 頁。

<sup>39</sup> 可參閱：張瑞德：同註 37，第 1078 頁。

<sup>40</sup> 同註 37，第 1078 頁。

<sup>41</sup> 同註 37，第 1078 頁。



雖然中國落後弱小的形象已不復存在，但是歷史教訓仍需銘記。1995年7月7日的《人民日報》號召人們繼續堅持鄧小平二十年前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只有經濟、科技發展才能保證國家的自主與和平，相反，「落後就會挨打」。和抗戰時期相同，江澤民領導下的共產黨仍「以民族大義為重」，所以，應把祖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sup>42</sup>。《人民日報》上另外一篇7月31日的刊文也同樣轉換了視角，談到了民族復興，因為「統一則民族興」。文章建議國民黨繼1924年和1937年之後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因為「海峽兩岸的中國兒女應該求同存異」<sup>43</sup>。隨著光復節腳步的逼近，臺灣問題越發成為焦點。但事實上，儘管香港澳門雙雙於1997和1998年回歸大陸，統一中國的計劃卻隨著臺北政府的強硬政策而更加前途未卜。

## 破鏡難圓

1995年1月，江澤民重申了和平統一的原則，李登輝總統則做出對抗性的外交姿態，表示中華民國是政治獨立的主權國家，有權決定實現統一的時間和方式。李登輝此時正在準備1996年3月的總統競選，因擔心台獨人士抨擊，於是在1995年數度出訪國外，使兩岸關係變得十分緊張。其中1995年6月的訪美影響最大，造成了臺海局勢緊張和1995夏季、1996春季的危機<sup>44</sup>。在抗戰紀念顯得格外重要之時發生此事，使中國政府對李登輝的舉動十分不滿，而其中的原因頁和李登輝本人的一些特殊之處有關。

李登輝生於1923年，他家世顯赫，受的是日本教育。1943年，中國已正式投入抗日，李登輝則在該年被京都帝國大學錄取，數月後參加日軍。他深諳日本語言文化，從不掩飾對日本和日本人民的親切感。這種感情越來越影響著他的政治生涯。2000年初，他接受日本作家小林善紀邀請，參與了漫畫《臺灣論》的創作。該書追溯臺灣民族史，將日治時期描繪得十分理想，把接管日據臺灣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比作希特勒、史達林獨裁政權<sup>45</sup>。

1995年秋夏，海峽兩岸對話的語氣變得特別強硬。8月25日，人民大會堂召開抗戰老兵紀念會，江澤民在會上駁斥某些西方人士支持臺獨勢力，蓄意分裂中國<sup>46</sup>。這段騷動時期被中國認為是民族危難，需以史為鑑。8月30日，人民大會堂迎來了一些中科院的歷史學家和中共黨史研究所研究員，儘管慶祝的名義是抗戰勝利五十週年，與會黨內要人的講話重心卻落在臺灣問題上，稱臺灣問題被不願

<sup>42</sup> 參閱：張瑞德：同註37，第1080-1081頁。

<sup>43</sup> 同前註，第1082頁。

<sup>44</sup> Jean-Pierre Cabestan, "Nouvelle crise dans le détroit de Taïwan" (參考譯名：臺灣海峽新危機),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n°771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96).

<sup>45</sup> 小林善紀：《臺灣論》(台北：2001年)，第125-140頁，第143頁。

<sup>46</sup> 同註37，第1088頁。

中國崛起的人所利用，而「歷史的教訓必須銘刻」：面對外來威脅，民族統一變得更加必要。講話批評最多的是李登輝，指責他不僅勾結西方國家，還滿足西方分裂中國的野心<sup>47</sup>。

十年後，抗戰六十週年紀念變得風平浪靜得多。2000年3月，臺灣總統選舉產生了新的執政黨：陳水扁及其領導的民進黨。民進黨摒棄國民黨始終秉持的統一理念，準備建立臺灣共和國，於是有步驟地弱化臺灣和大陸的感情。為了鞏固臺灣社會的獨特性並從歷史和文化上漸漸切斷與中國母體的聯繫，去中國化的政策再次出現。儘管如此，兩岸間的緊張關係僅僅限於喊話。2005年3月14日中國政府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規定不放棄以武力方式解決臺灣問題，這項法律的內容雖然強硬，但此法頒布後，大陸處理臺灣關係的態度卻變得更為開放。幾週後，也就是2005年4月底，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會見了中國主席胡錦濤，胡錦濤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身份接見了他。在兩黨長達半個世紀的對峙後，二人的會面頗具象徵意義，多少有點「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意味。新的聯盟則為共同對抗台獨。

無論如何，國共兩黨關係的改善和2005年抗戰紀念活動的內容變化脫離不了關係。

## 納入中華民國歷史的共同記憶

在2005年9月3日的慶祝儀式上，胡錦濤講話的部分主題是1995年一樣，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內容<sup>48</sup>。胡錦濤向60年前的偉大勝利致敬，強調中華民族在日本侵略時面臨的「滅國滅種」的絕境，而中國人寧死不作「亡國奴」<sup>49</sup>，「捍衛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發展的文明成果」。這段慘痛的經歷讓中國汲取教訓，明白了只有國家強大，民族才能振興，才能在國際社會上贏得自主。胡錦濤認為孫中山生前正是有感於此，才不懈推動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所以，現在的中國主席雖然承認一百年以來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卻仍要強調有必要團結包括、港澳臺和海外華僑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因為他們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力量源泉」。

這段追述抗戰的演說提及當年險將亡國之痛，把這段歷史描述得可歌可泣，但其用意應該並不僅在打動人心，引人注意。雖然紀念儀式之措辭總以感人為宜，倘若聯想到當時的海峽兩岸關係和臺灣政治環境的演變，就可看出這段話用意深長。首先反映出胡錦濤內心的擔憂，他的語氣和用詞令人想起國民政府遷臺時期經常聽到的修辭。例如1950年3月，蔣介石復行視事不久，稱中華民國「幾乎已等於滅亡了」，並稱其人民如「亡國之民」<sup>50</sup>。

<sup>47</sup> 同註37，第1088-1089頁。

<sup>48</sup> 該講話的內容見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665666.html>，擷取日期：2008年8月。

<sup>49</sup> 該詞的字面義思是人民因國家滅亡而淪為奴隸。

<sup>50</sup> 蔣介石：〈復職的使命與目的，民國39年3月13日〉，該文收錄於張其昀所著之《先總統蔣公全集（第2卷）》（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1956頁。

從日本侵華初期直到內戰一直都有人擔心中華民國將亡，甚至中華文明將亡。1937年8月，蔣介石在向全國報告戰場實況時，稱抗戰為「救亡」<sup>51</sup>。之前一年，包括胡適在內的若干知識分子指控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造成共產黨勢力壯大及統一戰線的建立，是「將使救國之初心，得亡國之惡果」<sup>52</sup>。許多民眾甚至用血書寫「寧成為死鬼不做亡國奴」<sup>53</sup>的傳單。胡錦濤在抗戰60年後的講話，表現出同樣的決心。

保衛國家和民族，不僅僅是要保護經濟，還要保護歷史文化財富。因此，為了民族延續，才會有數以千計的人不惜一切將工廠、學校、圖書館和博物館從淪陷區遷出<sup>54</sup>。內戰期間，考慮到北京新建立的政權要推翻傳統，似乎無意保存歷史遺物，連紫禁城的文物也請出宮殿，幾經輾運至臺灣珍藏。

如果胡錦濤的沉重語氣能充分反應30、40年代中國社會的感受，那麼，我們就不難理解臺獨政策給現代中國的感受了。臺灣的官方說法毫不隱瞞對於中國認同的敵意，自然使中國擔憂民族何以延續。更何況大陸已經把中華民國和臺灣的經歷納入中華民族的歷史，胡錦濤講話提及孫中山，是想把兩個政體的命運聯繫起來。孫中山被奉為中華民國的國父，在胡錦濤的講話中代表著重建新中國的精神支柱。特別是最後這一點，使其講話頗具新意。

胡錦濤講話中數度表示中國歷史已不再被看作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軸的歷史，糾正了以往出於一時政治需要而扭曲歷史的不實之說。因此，1937年7月7日被認為是民族團結的重要時刻，「九一八事變是抗日戰爭的起點」。透過這番新詮釋，我們可以更明確地分析國共兩黨在抗戰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抗戰初期與日軍正面交鋒的主要是由南京政府領導的軍隊，率領這些軍隊的是在黃埔軍校培養出來的國民政府軍官。共產黨當時主要負責抗日宣傳，同時也利用這些宣傳拉攏地方勢力和部分國民黨軍隊。出於種種原因，這些人可能會被南京政府腐敗無能的言論所打動，轉而支持共產黨。於是，在1932年上海戰役立下輝煌戰功的十九路軍，因為對1933年民國政府在熱河戰役後簽署的停火協議感到失望，拒絕「剿滅」共產黨根據地而響應彭德懷聯共抗日。數星期後，這支軍隊被民國政府派遣的大軍擊潰，卻沒有得到共產黨的任何支援<sup>55</sup>。

當胡錦濤向30年代初期尤其是淞滬戰役的戰鬥英雄致敬時，聽眾的腦海裡難免會浮現上述的歷史背景。而當他讚揚1945年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永久成員，取得重要的國際地位時，他也將這段以往只屬於中華民國的歷史記憶變為已有了。如此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北京、臺北、大陸或臺灣，似乎不必再分得那麼清楚，大家歷經的是同一歷史進程，都是中華民族的進程，雖然有不同的經歷，但是應該交融為同一份記憶。

<sup>51</sup> 泰孝儀：《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卷15）（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605頁。

<sup>52</sup> 同註三，第298頁。

<sup>53</sup> 圖片資料見紀錄片《抗戰》（中國電視公司：2005）

<sup>54</sup> 孟國祥：〈西遷西運，另一種「萬里長征」〉，《新民晚報》（A19），2005年7月7日。

<sup>55</sup> 同註三，第291-293頁。

上行而下效，此話一出，媒體也紛紛刊登國民黨老兵的見證。上海《新民晚報》的抗戰六十週年專題報導中用整版篇幅描述了 1945 年 9 月 9 日的受降儀式。報導訪問了一名參加過淞滬戰役、後又參加安徽運動、繼而轉戰緬甸的老兵，記述他看到南京人民熱情歡迎國軍的感動，以及目睹頑敵終於投降的滿足<sup>56</sup>。雖然言論有所開放，禁忌有所解除，但是原先的形象在人們的心中還是根深蒂固。許多以抗戰時期作為題材的著作或影片仍然譴責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而對於共產黨的抗日決心則大書特書<sup>57</sup>。這一解讀再度受到許多歷史學家的批評，尤其是過去只能在學術圈內發表言論的中國學者，現在也能在大眾刊物上一抒己見了<sup>58</sup>。

2005 年也是光復節首次在中國大陸受到國家級別的關注，過去這是只有臺灣人才紀念的。紀念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並邀請臺灣重要人士參加，包括支持統一、1993 年從國民黨分離出的新黨黨主席。與會來賓均獲贈中央電視臺 CCTV4 在同年夏天播放過的紀錄片《不能忘卻的歷史--紀念臺灣光復 60 週年<sup>59</sup>》。該片及內附小冊均強調自 1895 年以來臺灣人民反對日本殖民者的不懈抵抗。胡錦濤在 2005 年 9 月 3 日的演講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解讀歷史，試圖把臺灣和大陸的經歷聯繫起來<sup>60</sup>。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希望超越歷史的分裂，盡可能傳播兩岸擁有的共同記憶；但是台灣的作法似乎與此背道而馳。

### 三、關於破裂的記憶：關於抗戰的不同解讀

自 50 年代起，中華民國和日本一直維繫著良好的關係，日本在外交上承認臺灣，抗戰紀念因此主要以協會和個人組織的名義進行。直到 70 年代末期，中華民國政府才開始舉辦抗戰紀念活動。第一次全國性的慶祝活動是在 197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紀念日舉行的。這一變化起因於 1972 年日本和臺灣斷絕外交關係，因此民國政府不再需要特別顧慮日本右派人士的反應。同時，由於中國對於中華民國的歷史越來越感興趣，台北不希望北京獨占歷史解釋權，特別是關於一些對民國政府相當重要的時期的詮釋<sup>61</sup>。在 80 年代末期之前，臺灣將抗戰的焦點擺在國民黨軍隊在大陸的經歷上。如上所述，抗戰時期臺灣本土的親身經驗至少在官方版本中被草草帶過，政府強調的是團結抗日的意志和決心，常常把這些價值觀用多少有些牽強的方式加諸於臺灣人民身上<sup>62</sup>。

<sup>56</sup> 潘高峰：〈王楚英：在中國大地見證日本投降一刻〉，《新民晚報》A19 版（2005 年 6 月 25 日）。

<sup>57</sup> 同註 53。

<sup>58</sup> 可參閱：京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大歷史觀下的抗戰〉，《鳳凰週刊》2005 年 6 月第 18 期，第 18-24 頁。

<sup>59</sup> 於慧堅：〈高調紀念臺灣光復〉，《中國時報》（2005 年 10 月 26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擷取日期：2008 年 8 月。

<sup>60</sup> 參閱：文獻紀錄片《不能忘卻的歷史—紀念臺灣光復 60 週年》（中央電視台：2005 年）。

<sup>61</sup> 同註 3，頁 1076-1077。自 1950 年起，臺灣光復節成為法定紀念日。

<sup>62</sup> 如藍適齊評價電影《梅花》中存在此類解讀。同註 14，第 11 頁。

90年代臺灣的民主進程和多黨制的活躍同時也伴隨著對過去的主流歷史記憶的質疑。「統派」的政黨對於1937到1945年的歷史仍然偏重「傳統」觀點，只是特別彰顯這段歷史對臺灣的影響和意義。民進黨則認為抗戰和臺灣不相干，對抗戰不提、不紀念，公開表示冷漠。

1995年夏初，臺灣兩大日報的社論探討了詮釋抗戰進退維谷的局面。《中國時報》在七七事變紀念日當天刊登的社論，稱抗戰勝利是「完成中國統一大業」。這一傳統論點和中國的說法十分接近，讚揚中華民族團結驅逐外強，收復失土，以同心協力的精神克服重重難關，使「中華……長存於世」。

相對於上述熱情澎湃、傾向於統一聯合記憶的《中時》社論，同一天的《自由時報》社論則是一篇冷淡的歷史批評分析。該文無疑是受了數週來臺海危機的影響，對七七事變提出了不同於以往的解讀：所謂的「國共合作」其實是貌合神離，表面上談合作，私底下卻在準備日後毫不留情地交戰。因為雙方都不懷好意，所以1945年之後才會衝突不斷。此外，文章認為稱抗戰「勝利」並不恰當：昔日戰敗的日本現在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文化上都比中國和臺灣更強。海峽兩岸不應以勝利者自居，反而應該對30年代以來所持的態度感到「慚愧」<sup>63</sup>。中華民國的歷史對中國大陸的意義越來越重要，顧及將來可能實現的統一需要感情基礎，中國關於民國時期記憶的宣傳變得越來越開放。而臺灣，特別是支持臺獨的陣營，卻逐漸走向記憶的「幻滅」。1937至1945年這段期間已經不再被視為攸關民族存亡的偉大時刻，而是就其歷史和政治的意義冷眼剖析。

## 迴盪著各種記憶的臺灣社會

正當歐美大張旗鼓地舉辦二次大戰勝利50週年紀念儀式的時候，臺灣的紀念活動相對低調，有些人認為這是由於李登輝總統對日本懷有特別深的情感所致。1995年4月底，立法院在一番激辯後通過了一項法案，決定興建一座臺灣抗日英雄紀念館，並樹立一座抗戰勝利紀念碑。同年7月5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紀念活動組織要點，在這一年不僅要舉辦抗戰勝利紀念活動，還要慶祝臺灣光復，提醒大家不要忘記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推動各項建設，促進臺灣的繁榮發展，顯示國家的前途與國民黨的治理息息相關。雖然愛國情操還是受到推崇，但是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特別強調中華民國政府在戰時和光復後對臺灣的重大貢獻<sup>64</sup>。

9月3日，李登輝發表了另一場演講，呼籲民眾記取歷史教訓，他把愛國心放在首位，強調要以「民族大義」為重。「民族大義」一詞同年在大陸也多次提到。然而，李登輝所說的民族大義是在暗示海峽彼岸的威脅違反了北京自己再三重申的原則：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李登輝重申國民黨在抗戰中的領導地位以及1945年以後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在1941年宣布發動抗日戰爭的是國民黨，在1945年

<sup>63</sup> 同註3，第1099頁。

<sup>64</sup> 同註37，第1095-1096頁。

接受日軍投降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一員的也是國民黨。國民黨在臺灣創造了經濟奇蹟，實現了當年想在大陸推行卻始終不能成功的政治及社會改革<sup>65</sup>。他所談的 1937 至 1945 年的歷史其實矛頭指向眼下的兩岸形勢，圍繞著臺灣領土打轉。李登輝一方面不讓中國單獨居功，維護國民黨在歷史和政治上應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強調國民黨和臺灣的密切聯繫。

除此之外，在臺灣還有另一種更多從感情出發的解讀，類似於過去在大陸盛行多年的詮釋。抗戰勝利意味著結束了列強對中國長達一個世紀的羞辱和壓迫，勝利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抗戰勝利帶來了臺灣光復。慶祝抗戰勝利同樣要向海外華僑致敬，他們當中也有抗戰英雄<sup>66</sup>。這種「大中華」歷史觀比較接近與李登輝對峙的非主流派立場。提到國家前途固然有光榮的一面，但也不掩飾其脆弱的一面。8 月 13 日，新同盟會在臺北舉辦從中正紀念堂走到國父紀念館的《我是中國人》大遊行，選擇這兩個地點當然是為了這兩位領袖在中華民國歷史上的意義。遊行中有許多抗戰老兵。新同盟會主席許歷農和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上台發言。和親日的李登輝相反，他們雙雙指出日本侵略者的罪惡本質和滔天罪行，以及中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許歷農要求到場所有人默哀一分鐘，向受害者致敬。許、郝兩人提醒大家，中華民國正面臨著中共的武力威脅和台獨勢力崛起的新危機，因此必須團結起來保衛國家，捍衛代表五千年中華文化的中華民國<sup>67</sup>。

在這一年發行的紀念幣、紀念章和其他紀念物具體呈現出臺灣社會多元的記憶。這不僅表示臺灣多元化再現抗戰，還揭露了臺灣關心的新問題：重新回想這段歷史的同時應該如何定位臺灣。有的金銀紀念章上鐫刻蔣介石在廬山會議上號召抗日的圖像，有的印著 1945 年 9 月 9 日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儀式<sup>68</sup>。另外有一些紀念幣，則印著臺灣領土的輪廓，或是舉行收復臺澎金馬簽字儀式的中山堂<sup>69</sup>。

無論如何，李登輝 10 月 25 日的演講顯示出對其政府而言，1995 年這一連串紀念活動的主要意義在於抗戰歷史與臺灣當代社會和政治的關係。當李登輝提到團結、發奮和超越自我等價值觀時，他所關注的是臺灣社會。李登輝稱臺灣人是「命運共同體」，除了原住民以外，共同體中每個人的祖先都來自大陸，應同樣為戰後獲得的進步成就感到歡欣。事實上，臺灣的經濟繁榮、政治開放，已經使其成為國際舞台上的一股力量。臺灣人應引以為傲，停止本省人和外省人互相對立的內鬥，因為兩者都是屬於同一國族的共同體，都是「新臺灣人」<sup>70</sup>。

李登輝的演講再度提及他首任總統任內最關注的問題：平息各族群之間的糾紛，確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然而，「命運共同體」和「新臺灣人」的概念將臺灣社會置於另一個歷史

<sup>65</sup> 同註 37，第 1094-1096 頁。

<sup>66</sup> 參閱：〈臺灣光復 50 週年紀念幣〉，《經濟日報》（1995 年 10 月 20 日），第 24 頁。

<sup>67</sup> 同註 3，第 1104 頁。

<sup>68</sup> 〈敦煌代理臺灣光復五十週年紀念章〉，《經濟日報》（1995 年 11 月 6 日），第 21 頁。

<sup>69</sup> 〈臺灣光復 50 週年紀念幣〉，《經濟日報》，第 21 頁。

<sup>70</sup> 參閱：李登輝演講稿全文，《中央日報》（1995 年 10 月 25 日），第 2 頁。

向度中。在紀念活動時迴避歷史記憶和感情，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後看。說臺灣人根繫大陸，卻不是為了弘揚中華民族的共同歷史。自 1945 年起開始了一段新的歷史，也只有這段新的歷史才可以凝聚這個新的「命運共同體」中的成員。李登輝的這番理論遭到國民黨內部諸多批評。郝柏村在同一天向媒體宣稱抗戰最重要的成果是臺灣光復。臺灣光復的那一天是整個中華民族、中華民國政府及國民黨最光榮的日子。他駁斥「新臺灣人」的概念，呼籲臺灣人莫忘自己是中國人，「要做有尊嚴、有自尊的中國人」<sup>71</sup>。按照郝柏村的發言內容，他所謂「有尊嚴」就是要延續抗戰的記憶，要融入到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中。他不同意李登輝的言論，並對台獨迴避歷史、否認記憶的新立場感到痛心。

## 被抽空的記憶

1994 年 12 月，支持臺獨的民進黨員陳水扁當選臺北市長。1995 年，正當中央政府慶祝「抗戰勝利和臺灣光復」時，臺北市卻別出心裁地紀念「落地生根，終戰五十年」。幾位市議員強烈批評這一主題有曲解歷史之嫌。他們認為「終戰」一詞是日本人用來淡化戰敗恥辱的委婉說法，採用這種說法，就是否認臺灣和大陸曾經抗日，既否定了臺灣曾被日本殖民的歷史，也抹煞了大陸曾被日本侵佔的記憶<sup>72</sup>；附和日本人的說法對不起先賢先烈，侮辱了臺灣人的尊嚴，使「亡國」的憂慮再度浮現：要亡其國，先亡其史<sup>73</sup>。

包括王曉波在內的知識分子也聲援議員，台北市政府於是不得不做出解釋。陳水扁稱戰爭對參戰雙方都很殘酷，所以不願強調戰爭的結局。陳水扁認為這一中性用語不提成敗，有利於促進世界和平<sup>74</sup>。這一說法使許多人感到困惑，臺灣大學陳昭瑛教授感到懷疑的是，紀念儀式怎麼可能不帶任何道德評價。用「終戰」指稱這一歷史性的時刻，相當於抹殺了社會和人的層面，剝奪了臺灣人一部分的歷史記憶。為了具體說明，陳昭瑛舉了臺灣歷史學家連橫的例子。連橫為了紀念抗戰，為他生於 1936 年的孫子取名連戰。在連橫的心目中，抗戰和臺灣的命運息息相關，抗戰勝利才有臺灣光復<sup>75</sup>。連戰出生在陝西，後隨家人返台，在祖輩生活的地方又重新紮下根來，他後來加入國民黨，在「終戰之爭」發生的 1995 年他正是當時的行政院長。各方不同的感受和觀點使《中央日報》做出了一個無奈的結論：大家明顯各說各話<sup>76</sup>。同樣的歷史事件引起各方不同的感受，結果就好像發生了完全不一樣的事。2000 年初的政黨輪替也進一步加劇了記憶的矛盾。

<sup>71</sup> 蕭衡倩：〈說文解字臺灣光復 50 年變成「終戰」50 年—郝柏村：這個是不對的〉，《聯合晚報》（1995 年 10 月 25 日），第 3 頁。

<sup>72</sup> 彥瓊真：〈台北市政府終結抗戰議員要求光復〉，《中央日報》（1995 年 10 月 25 日），第 3 頁。

<sup>73</sup> 王秀芬：〈附和日本不承認侵華史實對不起臺灣抗日先賢先烈〉，《中央日報》，第 3 頁。

<sup>74</sup> 李天怡：〈陳水扁辯稱「終戰」祈求和平〉，《中央日報》，第 3 頁。

<sup>75</sup> 楊永妙：〈終戰會讓臺灣前輩悲哀〉，《中央日報》，第 3 頁。

<sup>76</sup> 〈異戰終戰〉，《中央日報》第 3 頁。

## 記憶：不忘過去，人生才有尊嚴和意義

2000年3月，陳水扁當選總統，四年後又連任。這是自1945年以來，國民黨第一次成為在野黨。民進黨執政期間，各個民族歷史關鍵時刻的紀念方式產生了重大變化。新政府要一改以往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觀念，把重點放在臺灣本土。

2002年起，10月25日雖仍是紀念日，卻不再是法定假日。這一天，官方紀念的是「終戰」而不是使臺灣回歸中國統治的「光復」。以高中課本為主的歷史教科書於2006年發行新版，內容比較接近殖民時期的生活經歷，而非日據、抗戰的歷史，對日本少有怨言，卻特別強調日本人的建設對臺灣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sup>77</sup>。

這些變化使在野黨人士感到十分不解。即使沒有親身經歷抗戰的人，提及這段歷史都充滿感情。2001年的七七事變紀念日，隸屬於國民黨的台北市長馬英九在台北市府文獻會舉辦的照片展上致詞。馬英九對全國性紀念儀式被淡化感到遺憾，認為這有逐漸抹殺歷史記憶的危險。他痛斥李登輝等諸多政治人物的親日傾向，提及李登輝之兄參加日軍陣亡，日軍殘暴侵華應是國恨家仇，不明白李登輝究竟站在什麼立場。話至此時，馬英九潸然淚下，呼籲大家千萬要把這段歷史銘記於心<sup>78</sup>。

生於香港、祖籍湖南的馬英九，自認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面對一度被認為是中華民國最為光榮的歷史現在卻遭到沉默和冷漠對待，馬英九肯定會感到失去了自我認同的符號，也失去了個人和家庭歷史的歸屬。在那段外省人常被最偏激的臺獨人士視為「異鄉人」的時期，他們或許需要從歷史中尋找自己在一番漂泊後終於在臺灣落地生根的意義。因此，知道臺灣人也曾參加抗戰，大家擁有共同的情感和感受，馬英九這一代的人才能合理解釋自己的人生。有一些臺灣人以作臺灣人為榮，但對於另一些本省籍和外省籍的臺灣人而言，榮耀卻來自一個比臺灣本土範圍更廣的歸宿，一個深植於大陸的「根」。

2005年抗戰紀念活動的核心是尊嚴和榮譽。相對於「挺胸膛抗日」的臺灣人民，有些臺灣人「看到日本人就矮了一截」，侮辱了「臺灣人的風骨」<sup>79</sup>。

9月9日國民黨召開紀念儀式，隆重慶祝1945年日軍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sup>80</sup>，紀念活動的規模是史無前例的。在活動持續的數星期內，國民黨總部的牆上一直掛著被馬英九譽為「抗日先賢」的蔣渭水、

<sup>77</sup> 可參閱：歷史教師對新教案的好評〈百無禁忌高中臺灣獨立〉（中央社，2006年8月15日），<http://www.cna.com.tw>，擷取日期：2007年9月。

<sup>78</sup> 董智林：〈不解李登輝為何再掀波濤，不解日軍殘暴歷史被中央政府淡化〉，《聯合報》（2001年7月8日），第4頁。

<sup>79</sup> 董智林：〈紀念抗戰60週年國新活動多〉，《聯合報》A6，（2005年7月6日）。

<sup>80</sup> 李祖舜：〈推崇蔣渭水、李友邦馬斥呂「臺灣地位未定論」〉，《中時晚報》（2005年9月9日），<http://www.chinatimes.com>，擷取日期：2008年8月。



李友邦、林獻堂和羅福星等人的巨像，視他們為歷史記憶的守護神，隨時提醒人們銘記以血淚寫成的光榮歷史，不要扭曲歷史，喪失尊嚴<sup>81</sup>。由於這些先賢之中，也有本人或其親人曾遭受白色恐怖迫害的，所以馬英九在紀念儀式上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承認國民政府對他們遭受迫害負有責任，並向其家屬致歉。這些先賢懷著強烈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堅決抵抗日本殖民者，多作為國民黨黨員支持大陸抗日。現在他們的家屬出席紀念儀式，使這些臺灣前輩菁英和臺灣當代社會的聯繫更為緊密。蔣渭水之子和李友邦之妻的出席一方面是原諒與和解的表示，另一方面至少也象徵性地重新肯定了臺灣和大陸命運相連的歷史經歷。這次活動同時還紀念了甲午戰爭 110 週年。馬英九提起當時康有為曾號召兩岸文人聯合上書，請求光緒皇帝不要簽署馬關條約，結果臺灣、澎湖仍難逃被割讓的命運，使這些文人悲憤填膺<sup>82</sup>。

國民黨以抗日先賢的傳人自居，視這些延續著共屬感的記憶為尊嚴之源；而民進黨則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來追思這些抗日先賢。

2007 年 7 月，在臺灣民眾黨建黨八十週年紀念之際，謝長廷、馬英九兩位總統候選人就雙方對於蔣渭水的記憶展開辯論。謝長廷以二二八事件後蔣渭水家人的遭遇來反駁馬英九，他說事實證明國民黨在光復初期對臺灣人民冷酷無情，其表現無異於「外來政府」。謝長廷認為這不足為奇，因為那時的臺灣社會和中國大陸並沒有特別親近的關係<sup>83</sup>。一方尋求統一，另一方想獨立自主，對峙的雙方都善於利用抗戰紀念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做出有利於自己的解釋。

2008 年三月底國民黨重新執政，各方的立場趨向緩和，也不再用激烈的方式談論抗戰，這一轉變顯然和兩岸關係好轉有關。馬英九只在九三軍人節和臺灣光復節的紀念儀式上發表了兩場內容平實的演講，其他的紀念日並未舉行全國性的紀念活動。在中國大陸，許多人透過網路撰文或討論譴責胡錦濤在 7 月 7 日赴日參加 G8 高峰會，而沒有留在國內主持重要的七七事變紀念儀式<sup>84</sup>。胡錦濤在兩個月前才剛在日本進行了一次時間較長的訪問，這次再度出訪確定了中日關係的新趨勢：中日兩國都有盡釋前嫌、攜手合作的意願，所以抗戰紀念活動就相對顯得低調，反倒是 10 月 24 日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三十週年紀念日，在北京舉辦了盛大的慶祝活動<sup>85</sup>。

今後，不論是在臺灣還是中國，傳播抗戰記憶的主力很可能不再來自政府，而是來自民間社會所舉辦的文化活動或發行的文化產品。由於海峽兩岸關係和各自內部局勢的變化，抗戰越來越少被視為政治籌碼，這將促進相關學術研究的發展，讓學者能真正深入探討一些過去未曾觸及的問題。政治鬆

<sup>81</sup> 馬英九：〈紀念臺灣光復「甲子」重溫先賢典範再造臺灣精神〉，《中國時報》（2005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chinatimes.com>，擷取日期：2008 年 8 月。

<sup>82</sup> 李祖舜：〈推崇蔣渭水、李友邦馬斥呂「臺灣地位未定論」〉。

<sup>83</sup> <http://www.rti.org.tw>，擷取日期：2008 年 8 月。

<sup>84</sup> 〈七七事變週年紀念日胡錦濤訪日引批〉（2008 年 9 月 3 日），<http://big5.soundofhope.org>，擷取日期：2008 年 9 月。

<sup>85</sup> “China, Japan leaders attend reception marking peace treaty anniversary“, *Xinhua News Agency*, October 24, 2008.

綁將擴大創作空間，不論是文學還是電影，都可能向人們呈現出抗戰的新面貌，顛覆至今為止還在集體想像中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之一，便是對民國政府尤其是蔣介石的負面評價，這種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批評並不公允。此外，歷史詞彙有時會現身在狂熱的體育競賽中，例如臺灣的棒球隊在北京奧運對抗日本隊，某些臺灣報紙刊出的標題稱臺灣人並非比賽而是「抗日」<sup>86</sup>。此外，在部落格上也經常出現讓人聯想起中日衝突時期的用語，例如鼓勵運動員打倒「日本鬼子」<sup>87</sup>。抗戰話題在中國也常惹爭議，像預定於2008年冬季在大陸上映的臺灣電影《海角七號》<sup>88</sup>便引起了軒然大波。這部影片以兩對分別生活於日據時代和現代的中日情侶為主軸，在臺灣登上票房冠軍，上映不久，即以盜版光碟和網路下載的方式傳遍大陸。中國網民對該片百般批評，認為充斥著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懷念。中國政府根據臺灣媒體的報導，唯恐《海角七號》在大陸公映會引起騷亂，於是無限期拖延放映日期<sup>89</sup>。上述各種反應顯示出1937到1945年的這段歷史雖已漸漸不再是政治籌碼，卻仍會在兩岸社會掀起不小的情感波濤，其意義仍然深長。

---

<sup>86</sup> 參閱2004年8月14日的《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等。

<sup>87</sup> 這是在2008年4月訪台期間認識的一些大學生親口告訴我的。

<sup>88</sup> 該片由魏德聖執導，於2008年夏末在台灣上映。

<sup>89</sup> 可參閱《自由時報》2008年12月2日刊登的報導，<http://www.libertytimes.com.tw>，擷取日期：2008年12月。